

“失去的20年”与“安倍经济学”增长战略*

任云

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固然与需求不足有关，但更多是由供给方面新陈代谢功能受阻、全要素生产率增幅放缓等问题所造成的。而其微观根源是日本传统的经济体系出现了严重的制度疲劳：金融结构老化，难以支持新产业发展；企业制度僵化，适应环境困难；政治失灵，管制过多。这一切阻碍了新陈代谢和资源有效配置，降低了日本经济的活力。安倍经济学的增长战略不仅如多数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缺乏力度，更主要的问题是战略本身忽略了触动及推进金融机构和企业加快自身制度改革这一重要内容。根本而言，日本经济还是要靠民间主体的自我革新来重建活力。

关键词：失去的20年 经济体系 制度疲劳 安倍经济学 增长战略

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出现了长达20年的萧条，各界人士称之为“失去的20年”。本文首先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微观经济体制角度阐述其深层理由，指出政治和政府的失灵、金融与企业系统的体制僵化导致日本经济新陈代谢功能严重不足，才是日本经济萧条的主要病源所在。最后，评价近期的“安倍经济学”三支箭之核心——增长战略。

任云系日本樱美林大学经济经营学系教授。

* 作者感谢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冯维江，以及匿名审稿人的宝贵评论及建议。

20年的长期萧条与宏观经济学视角的原因探析

（一）经济增长的长期变化和“失去的20年”

纵观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可谓是起伏跌宕。1956—1973年，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9.1%，堪称世界奇迹。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很快从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至1990年平均增长率为4.2%，高于同期美、德等先进国家水平，可谓一枝独秀。但是，19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萧条。^[1]

过去的20余年里萧条时间之长，问题之严重，实属罕见。1) 实际GDP增长率有五次为负增长，平均增长率仅有0.9%；1992年名义GDP为487.96万亿日元，而2012年反而只有475.57万亿，经济总量及人均量在世界排名中均下滑。2) 工薪阶层的平均年薪从1997年度的467万日元降至2009年最低点的406万日元，2011年度也只有409万。^[2]3) 消费者物价在1998—2005年，以及2009—2012年期间两次持续下降，而反映物价总水平的GDP紧缩指数从1994年最高的110.96开始几乎连年减少，2012年降低至91.57（2005年为100），这样长时间的通货紧缩在战后发达国家没有先例。4) 中央和地方财政赤字逐年迅速增加。2013年政府各类债务余额高达1097万亿日元，为GDP的2.28倍，在发达国家里最为糟糕。过去的20年里，日本经济凋零，国民普遍感到前途迷茫，信心丧失，所以日本国内称之为“失去的20年”。以下，首先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来探讨“失去的20年”的形成原因。

（二）长期萧条的宏观经济学分析

首先从需求角度分析。从大的走势来看，正如吉川洋指出的那样，高速增长时期，由于人口大迁徙以及家庭户数的不断增加，产生了旺盛的消费需求，拉动了民间投资特别是设备投资的增长，投资进一步唤起了消费，整个经济增长势头自然十分强劲。此后经济增速的放缓，正是由于上述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3]

[1] 数据来源：日本内閣府 SNA 数据 (http://www.esri.cao.go.jp/jp/sna/data/data_list/kakuhou/files/files_kakuhou.html)。

[2] 数据来源：日本国税厅各年度民间工资实态统计调查 (<http://www.nta.go.jp/kohyo/tokei/kokuzeicho/minkan/toukei.htm>)。

[3] 吉川洋，「マクロ経済」橘木俊昭編『戦後日本経済を検証する』東京大学出版会，2003。

1990年代以来的20余年里，占总需求比重六成的民间消费需求增速大幅度放缓，但仍略高于GDP平均增长率，而占总需求约三成的总资本形成特别是其中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为负，显著拉低了经济增长速度（表1）。另从储蓄角度来看，泡沫经济崩溃后虽然个人储蓄部分因人口高龄化的影响一直在下降，但企业储蓄，特别是大企业储蓄部分却大幅度扩大，导致民间储蓄净盈余一直维持在高位或增加，投资的严重不足造成了需求长期不足的局面。

消费低迷特别是民间投资长期不足的原因，在1990年代可主要归结于泡沫经济崩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严重的负资产效应，抑制了民间消费；大量不良债权导致银行金融功能低下，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甚至引发了数年的信贷萎缩；而企业也在泡沫崩溃后忙于清理债务，压缩了固定资产投资。但最近十多年的投资及消费的低迷，则主要是因为长期的通货紧缩及黯淡的经济前景，导致国民和产业界对未来严重丧失信心。

表1 日本总需求项目各期间简单平均增长率（%）

期 间	民间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固定资产投资(库存)		出口	进口
1955-1970年	8.71	4.09	15.04	11.60	13.82	13.81
1971-1980年	4.60	4.87	3.83	-7.30	9.72	5.47
1981-1990年	3.62	3.39	5.13		4.34	5.74
1991-2000年	1.22	3.26	-1.46		3.12	3.00
2001-2012年	1.18	1.53	-1.41		3.80	2.33

资料来源：1980年前参见：南亮进『日本の経済発展』東洋経済新報社,2002,p.118，其余根据日本内閣府SNA网数据计算。

而重视供给的学派，如林文夫和普里斯科特等认为需求不足不能很好地解释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1990年代日本的人均劳动时间减少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下降才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他们计算得出日本劳动力人均GNP增长率从1960—1970年的7.7%下降到1991—2000年的0.5%，同期TFP增长率从4.91%下降为0.191%。认为并不是需求小于潜在增长率，而是潜在经济增长率本身大幅下降了。^[1]林文夫进一步拓展了前项研究，在考虑IT产业带来的价格变化等影响后重新推算了TFP，得出了类似结论。^[2]

[1] Hayashi,F. and E.C. Prescott, “The 1990s in Japan: A Lost Decade”, *The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5(2002), pp.206-235.

[2] 林文夫,「第4章 日本経済の生産性の成長率」林文夫編『経済停滞の原因と制度』勁草書房,2007。

根据日本JIP数据库的经济增长统计资料，也可得出类似结论。如图1所示，1990年代以来劳动力数量投入增长率一直为负，资本投入增长率也从70—80年代的1.96%降到90年代的1.1%，21世纪头五年为0.42%，后五年则只有0.06%，TFP在70—80年代的增长率分别为1.51%、1.99%、0.98%、1.79%。而整个90年代平均为0.03%，进入21世纪后除2000—2005年达到1.07%外，2005—2010年又归于零，可见总体而言TFP增幅也大幅度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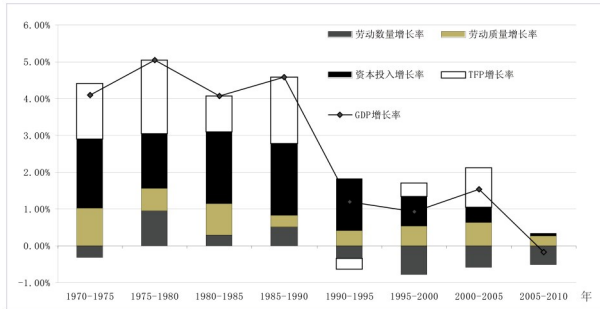


图1 各期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的统计分解

资料来源：根据JIP数据库（2013年）（宏观附加价值口径）数据制作。

从问题的复杂性来看，日本经济萧条有多方面的原因，不可割裂需求与供给来片面解释。但从问题的长期性来看，有必要多从供给方寻找原因。1990年代的长期萧条，与资本投入增速放缓以及劳动投入减少、TFP增速放缓有密切关系。资本投入增速放缓的一个直接原因是需求方的固定资产投资减少，而劳动力投入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的低出生率及人口老龄化，以及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缩短工时的影响。但为什么TFP增幅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下降？这个问题关乎经济改革的大方向，我们在下一小节重点论述。

（三）生产率增幅放缓原因的进一步解析

日本的制造业TFP在1990年代初期结束了较高的增长。笔者根据JIP2012年数据计算得出，2009年制造业的TFP与1970年比只提高了2.39倍。若按1970年到1991年的增速，制造业的生产率可提高4.12倍。另外，非制造业的生产率水平一直没有显著增长，2008年为1970年的1.25倍，2009年则仅有1.17倍。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在1990年代初曾一度达到美国的近80%，但2010年只有美国的67%左右，且低于英、法、德、意等国。^[1]

[1] 八代尚宏，《日本经济论·入门》有斐阁，2013，p.103。

TFP增幅大幅度放缓的原因近年已有了诸多分析。首先，从投入角度来看，深尾等发现日本信息通讯产业（ICT产业）的TFP上升幅度在1995年后尽管低于美国、韩国，但仍超过5%。不过ICT投入产业，如流通业及除电子机械产业以外的制造业从1995年以来TFP增长率大幅度降低。主要原因是这些产业ICT投资大幅度不足，商业、运输、金融、对单位及个人服务业等非制造部门的GDP增长中，ICT的贡献率在发达七国中处于最低或倒数第二。研究还发现，日本企业尽管在研发方面投入较多，但是在强化企业竞争力的投资方面，如在企业结构和组织改革，以及员工的脱岗培训上投入非常之少。由于近年来非正规雇佣的比重上升，这些人员难以得到在企业内充分的在岗培训，所以直接影响了劳动力素质。这也是拉低TFP增幅的一个重要原因。^[1]

其次，从新陈代谢的角度来看，金及深尾等人将制造业TFP增长率进行要素分解后研究发现，1990年代制造业TFP增幅下降，主要原因一是企业靠削减成本等努力所产生的内部效果增速降低；二是低效率企业关闭所产生的退出效果为负值；三是TFP较高企业新设所产生的进入效果增速也处于停滞状态。此外TFP增长中，内部效果贡献相对较大，而因高效率企业扩大规模、低效率企业缩小规模所产生的再配置效果的贡献相对不足。^[2]

内部效果增幅下降，表明企业通过内部管理合理化来提高效率的做法越来越难以奏效；退出效果为负，则是因为长期以来应该淘汰的企业没有退出，而效率较高的企业如汽车、电子零部件、通信器械等却通过向海外转移加速了退出，这显著拉低了平均TFP；此外，进入效果贡献为正，说明进入市场的企业总体生产率水平较高，不过这项效果在1990年代后不如1980年代贡献大，表明新设企业的趋势不够活跃；而对非制造业的分析表明，近十多年里大部分的非制造业资源再配置效果为负值，特别是建筑及运输业中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大企业的人员削减量显著，对整个非制造业的生产率下降有较大影响。凡此种种，与英美等国在经济环境较差时主要是靠缩小、关闭生产率较低的工厂，通过再配置及进入退出效果来提高生产率的情况形成了明显反差。

最后，对大企业及小企业分类研究，发现大企业及大工厂的TFP在1990年代以后仍然是上升的，但中小企业TFP增长率出现了停滞。大企业研发费用占比、出口占比及海外投资占比均较高，其TFP增长率一般也较高，而中小企业在

[1] 深尾京司，『「失われた20年」と日本経済』日本経済新聞社、2012，第2章。

[2] 深尾京司，『「失われた20年」と日本経済』日本経済新聞社、2012，第3章。

研发及国际化方面均处于落后状态。特别是大企业向海外转移也削弱了其与国内中小零部件供应企业在资本与技术上的合作关系，这也可能是中小企业TFP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1]

与深尾等人的分析类似，西村清彦等人的实证研究发现，日本企业的自然淘汰机制不够活跃，从1997年起更是出现了生产率低的企业生存率高，生产率高的企业反而淘汰率高的异常现象。^[2]木村福成等人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出口型企业以及对外投资企业的生产率增长要比国内的企业高。^[3]细野则从金融角度分析日本生产率的变化，认为金融危机导致金融中介成本上升，这直接导致新设企业以及生产率水平较高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而拉低了生产率增长水平。^[4]宫川分析认为整个90年代全部产业的TFP增加率都有下降，其中一半产业为负增长，但是各产业的TFP增长率与本产业就业人口数的变化基本没有相关，表明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配置。进一步对劳动生产率上升缓慢的原因加以分解分析，发现除TFP增长率下降外，劳动力的再配置效果在90年代为负。^[5]

综上所述，日本企业新陈代谢能力低，生产要素配置缺乏效率且流动性较低，是导致90年代以来生产率低迷的直接原因。那么，为什么要素不能得到有效的配置？为什么新陈代谢如此困难？有必要从日本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制度等更加微观的层次寻找答案。

长期萧条的微观原因之一：传统经济体系的制度疲劳

（一）传统经济体系的构造及特征

经济体系是规定各经济主体和要素之间关系的制度系统。经济体系的核心是金融系统以及企业系统，而政府是经济体系的参与者与政策制定者。二战以后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时期，日本形成了独特的经济体系。^[6]

[1] 深尾京司,『「失われた20年」と日本経済』日本経済新聞社、2012,第3章。

[2] Nishimura, K. G., T. Nakajima, and K. Kiyota. "Does the Natural Selection Mechanism Still Work in Severe Recessions? - Examination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in the 1990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58(1) 2005: pp.53-78.

[3] Kimura, F. and K. Kiyota. "Exports, FDI, and Productivity of Firm: Dynamic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s",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42 (2) 2006, pp.695-719.

[4] 细野薫,『金融危機のミクロ経済分析』東京大学出版会, 2010, 第5章。

[5] 宫川 努,『日本経済の生産性革新』日本経済新聞社, 2005, p.73。

[6] 详细分析可参见任云：“日本金融系统及企业治理机制的转型”，《日本学论坛》，2006年第1期，第15-20页；任云：“日本的企业制度及企业改革”，《日本学论坛》，2007年第2期，第31-37页。

日本的金融系统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以银行为中心，间接金融占优势，产业金融的特点突出。银行与大企业通过主银行制度建立起紧密合作关系：主银行与企业相互持股，它既是企业最大的债权人，也是企业大股东，对企业实施相机治理，并实施关系性融资。二是银行业受到政府“护送舰队”方式的保护，准入制度严格，而且银行与证券、保险业分离，各家银行业务相同，基本采取横向看齐的战略。三是资本市场由于法人企业交叉持股而不够活跃，对企业治理难以发挥作用。

而被称赞为“日本式经营”的企业系统，其公司治理制度是建立在法人企业交叉持股以及主银行制度基础上的，股票市场及一般股东对企业的制约能力极其薄弱，经营者有较大的内控权。其雇佣及人事制度实施的是长期雇佣、年功工资以及内部提拔。而供销和交易制度往往以“系列”为基础，注重长期合作和交易，特别是机械、电机产业等制造业以系列为核心，构建了丰田管理模式等日本独特的生产管理方式。此外，企业内工会制度也为员工与经营者提供了合作机制。日本式企业的一整套制度也说明企业与企业间，以及企业员工间有长期合作的特征。

从政府角色来看，日本政府战后沿用了战时经济的诸多做法，形成了重管制、重秩序的经济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以政府为中心，以业界团体、审议会为推手，通过限制竞争等措施来调整产业及企业间利益。具体而言，政府通过金融管制及产业政策培育及保护金融业及重点产业，政治家与官僚以及各产业利益团体构成了紧密的“铁三角”关系。

可见，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是一整套“关系型”制度，具有显著的命运共同体特征。这些制度与要素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封闭性、资本市场的低流动性又有着密切的互补关系（图2）。不仅如此，各项经济制度与日本人注重团体意识、强调合作与协调的文化取向一致，所以能很快普及并有效运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从金融系统来看，直到1980年代日本以赶超美国为目标，日本企业主要引进美国成熟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并进行模仿和改造。所以，银行对于产业的成长可能性以及成长技术过程有比较准确的把握，在证券市场不够发达的当时担负了有效分配资金的重要角色。而从企业系统来看，高速乃至平稳增长期的30多年里，总需求和总供给的不断扩大给企业持续扩大生产规模带来余地，企业舍弃当前的小利而追求长期发展所带来的大利。股东、员工及合作企业也形成了这样一种预期：只要维持长期合作关系，即便暂时获利不大，

最终总体上也会有更大回报。

正是由于日本经济体系的各要素之间基本性质相同，制度互补，且与环境相容，与文化同构，所以大大降低了经济活动的各种交易成本，促进了产业与企业的快速发展。不过，对政府介入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和金融管制、护送舰队等方式所起的作用近年则是否定意见居多。总体来说，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于民间的经济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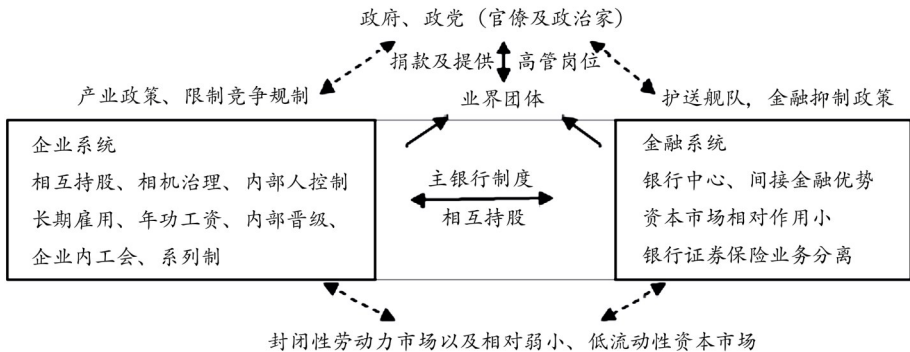


图2 日本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所形成的经济体系

(二) 传统经济体系的制度疲劳所导致的新陈代谢功能弱化

从1980年代起，随着日本经济所面临的内外环境的变化，曾经促进经济发展的传统经济体制弊端日益显现，特别是泡沫经济崩溃后，传统体制阻碍了经济结构的调整。这正是前文所说的导致日本产业TFP下降或停滞的最主要原因。这里主要从金融及企业方面加以具体分析。

1. 金融系统僵化

1980年代中期日本基本实现了追赶美国的目标，随着模仿时代的结束，风险较小的投资项目已所剩无几，银行几乎找不到新的增长点去投资。同时，大企业融资方式增加，或是自有资金雄厚，摆脱银行控制的实力增强。其结果是大量的银行资金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对泡沫经济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泡沫崩溃又使银行贷款出现大量坏账，加剧了经济萧条。

而在长期萧条时期，由于银企关系过度密切及银行判断失误等诸多原因，银行对关系企业采取放弃债权或追加融资的办法，使得本应被清算的非效率企业得以存活下来，而且由于造成预算软约束，企业往往缺乏重组的动力，这使得日本企业的效率提升缓慢，产业结构调整受到阻碍。研究表明，1990年代后银行系

统对收益较高的制造业贷款比例一直在降低，而对收益较低的房地产等行业贷款率反而提高，可见存在过度融资和追加融资的问题，导致不良债权问题迟迟不能解决。^[1]1998年后，由于拓殖银行和山一证券的接连破产，监管部门加强了监管，施加压力督促银行处理不良债权，至此银行对房地产、建筑业的贷款才开始减少。星岳雄等人的研究也认为，1990年代各个产业都有追加融资的现象，但非制造业比制造业的问题远为突出，银行系统对零售批发业、服务业以及地产业大幅度追加了贷款，这些产业大多是受到政府各种管制制度保护的企业，经济效益较低。^[2]可以说政府保护银行和存款，银行保护无生机的企业（zombie），形成了一种怪圈。凯巴耶尔及星岳雄等进一步研究发现，zombie企业比率大幅度增加的产业的生产率上升较其他产业缓慢。在zombie企业较多的行业里，业绩较为良好的企业也抑制了投资与雇工。^[3]这说明日本金融系统的偏差加剧或导致企业新陈代谢机能失效。由于不良企业的合理化改革没有进展，使得低价格、高工资、低收益成为定势，也易使潜在的高收益企业缺乏进入市场的积极性，从而进一步加剧银行寻找优良企业和项目的难度，使贷款更加缺乏效率。

实际上传统的金融系统在培育新产业、发展创新企业上具有先天的劣势。首先，发展高新技术风险型企业，需要发挥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及领导作用。只有市场中心的金融系统，特别是证券市场才能通过证券价格对这类企业的现在和将来价值进行适当的评估，将证券价格与企业家报酬挂钩，比如实行期权工资提高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的积极性，而银行系统不可能创造出这种激励机制。其次，知识型高新技术产业中虽拥有极优秀的人力资源，但缺乏可用于担保、抵押的有形资产。这样的企业难以得到银行的青睐，而若在资本市场融资，无形资产得到评估，融资也比较容易。最后，创新型企业往往需要不断摸索才能成功，其收益常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在市场中心的体系中，由于投资者都有各自的预期和风险偏好，这种预期的多样性和风险偏好的分散化使得创新企业也有可能得到投资者的投资。而由于银行回避风险，在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系统里，创新型企业则难以得到充足的资金。^[4]

[1] 櫻川昌哉，「金融の市場化と新たな資金循環」池尾編『市場型間接金融の経済分析』日本評論社，2006。

[2] 星岳雄、カシヤツブ，「銀行問題の解決法」伊藤隆敏等編，『ポスト平成不況の日本経済』日本経済新聞社，2005。

[3] Caballero, R., T. Hoshi and A.K. Kashyap, "Zombie Lending and Depressed Restructuring in Japa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8(5), 2008, pp.1943-1977.

[4] 任雲，『銀行中心のコポーレート?ガバナンス』学文社，2002，第5章。

据 OECD 在 1995 年、1998 年的两次统计，日本的风险投资规模与 GDP 比均在 20 个 OECD 国家中排在最后。^[1]近年来，这种状况也没有根本改观。自 2007 年以来，日本各年度的风险资金投资额一般在美国的 5% 以下。OECD 公布的 2012 年各国风险投资占 GDP 比的结果显示，尽管因欧债危机影响了欧洲国家排名，日本排名上升至第 16 位，但日本（2011 年数据）为 0.026%，与美、英等国的差距仍较大。^[2]

尽管 1990 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实施了多项金融改革，如 1996 年年底推出金融大爆炸改革，放宽其他行业进入银行业的管制，改革金融监管系统等，并在小泉时代加速清理银行不良债权，日本的金融系统进入 21 世纪后消除了泡沫经济的副作用，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也较小，但日本金融系统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以银行为中心的体系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直接金融的比例依然很小；传统产业占用大量资金，很难加以清理，而新兴产业却得不到有效的资金支持，发展受到阻碍。资金、资源和风险不能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和转移，这是日本经济 1990 年代以来 TFP 增幅放缓、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2. 企业系统的制度疲劳

企业系统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制度疲劳症上。首先，从国内大环境来说，进入 1980 年代以后，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期进入平稳增长及成熟期，特别是 1990 年代以来的长期萧条，更使日本企业的经营业务和经营资源面临着调整、重组的巨大压力。但是，日本传统的企业制度阻碍了企业调整和重组。

1980 年代起，在本行业逐步失去商机的时候，不少日本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向建筑、房产以及物流等方面发展，投资过剩的问题便日益显现。其实其他先进国家过去也出现过投资过剩，但日本的问题尤为突出。这是因为日本式企业制度更加助长了过度投资行为：日本式企业制度是一套促进企业扩大规模的制度体系，在长期雇佣制度下，经营者有维持员工雇用的压力。他们或是追求多元化经营，以便分流安置职工；或是维持甚至扩大主业从而错过事业调整的最佳时机。即使是资本收益率恶化，经营者也难以放弃追求企业规模的扩大。

1990 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陷入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境地，大部分企业出现了“三个过剩”，即投资、设备以及员工过剩问题。日本企业在 1990 年

[1] OECD, *A New Economy: The Changing Rol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Growth*, 2001.

[2] OECD, *Entrepreneurship at a Glance 2013*, OECD Publishing, 2013.

代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便是如何削减债务及重组。不幸的是，日本式企业制度恰恰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严重障碍。比如由于关系型制度的束缚，日本企业的重组和并购进程非常缓慢，低效率的企业难以淘汰；再如，由于企业的长期雇佣及年功工资制度，导致削减和调整人员比较缓慢。日本制造业的雇佣调整速度虽然从1990年代前期的0.16提高到1990年代后期的0.28，2000年以来更上升到了0.33，但依然比2000—2004年美国调整速度0.47低不少。^[1]

从国际大环境来看，1990年代以来信息化、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得企业的生产管理方式受到挑战，而传统的日本企业制度与新的管理模式不相匹配，影响了日本企业的竞争力。

自1990年代起，由于IT技术的普及，全球采购零部件、采用模块化方式跨国分工合作生产，成为欧美跨国制造企业取胜的法宝。而日本企业的传统优势，在于通过长期的合作或磨合，改善工艺，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效益。但是，在模块化产业迅速普及的时候，日本的企业系统及企业制度显然与这种生产方式不匹配。而且由于日本企业注重合作，注重长期稳定关系，所以企业在制定决策或调整战略时行动缓慢，惯性大；再者，由于日本企业一般各自都有一套经过多年磨合而形成的事业网络，所以较难适应通过市场原理在世界范围内利用或配置资源。此外，日本企业制度注重比较封闭的长期关系，所以常被认为不够公开透明，在海外经营容易发生冲突。凡此种种问题，导致日本跨国企业收益率较低，在国际竞争中常处于后手或被动状态。日本电子及家电产业近几年处于困境之中，与传统体制的束缚及这种体制下造成的经营战略失误有极大关系。^[2]

日本政府十多年来围绕着如何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做了一些制度改革。如鼓励企业开展兼并，提高企业治理结构的透明度，并于2006年推出了新公司法。政府还大幅度放开了派遣员工制度，以提高企业用工的灵活性。日本企业的经营模式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通过对1998年与2010年大企业问卷调查对比，可发现企业从过去重视销售额变得更加看重利益及收益率；股票市场上外国投资者所占比重大幅度上升，投资者对经营者的经营压力增加；企业使用派遣员工数量增加等。尽管如此，数据表明在多数领域里日本企业仍然显示出注重稳定及长期的

[1] 内閣府編，『経済財政白書』第170—171頁，2006。

[2] 近年，以电子器械为代表的一部分大企业的业绩不佳引起了各界严重关切。日本放送协会（NHK）在2013年年初播放了电视连续剧《日本制造》，讲述一家著名电器制造企业面临破产危机时与中国厂商博弈的故事，颇有大厦将倾之感。

倾向。如重视长期经营计划，注重与员工的长期合作，企业业绩恶化时员工雇用调整依然比较困难等。^[1]

近年来，日本企业一方面极力维持正式员工的福利和待遇，维持事实上的终身雇用制度，企业解雇正式员工的难度极大。^[2]但同时为了增加用工灵活性、降低用工成本而大量采用非正式员工。2008年非正式员工占劳动力比已经上升至32%。^[3]大量增加的非正式员工不能像正式员工那样接受企业内长期的在岗培训，其结果是非正式员工的人力资源投资不足，生产率水平较低，从而影响了整体的劳动生产率。这一点与深尾等学者经数量分析发现日本企业在组织改革以及劳动力培训等方面投资过少的结论完全一致。分析表明，非正式与正式员工的工资差距甚至要小于他们之间的生产率水平差距。换言之，许多企业宁可多付工资也要增加非正式工以增强用工灵活性，这进一步说明日本的传统企业制度改革不彻底、不完善。

以上分析表明，传统的日本式企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重组，使得非效率的产业和企业得以延缓存在。而为了增加雇用灵活性采取的增加非正式雇用的做法导致了新的致使效率下降的问题。至此，我们不难理解日本产业为何整体TFP增幅大大放缓，日本经济低迷不振了。

长期萧条的微观原因之二：政府失灵与过度管制的延续

（一）干预经济及保护既得利益的政策偏向

战后日本政府对经济的积极介入，在早期着重于开发与振兴，官僚处于指导者的地位。但从1970年代起，政府的作用更侧重于协调和再分配。这时维护产业秩序、限制竞争的倾向越来越突出。

长期以来，日本的经济决策系统是典型的条块分割型官僚多元主义（bureaucratic pluralism）^[4]，制定微观经济政策时政策部门、业界立法的特点较为突出。其立法过程是，首先由各主管部门内部开展调查、通过审议会等研讨进而拟定草案，

[1] 森川正之，「日本企業の構造変化」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12-J-017，2012。

[2] OECD 2013年公布的雇用保护指数中，日本的解雇难度远高于OECD平均值。表明日本企业对正式员工的保护仍然过多。

[3] 川口大司等，「日本経済の構造問題」小川一夫等編『現代経済学の潮流2013』東洋経済新報社，2013。

[4] 青木昌彦，『比較制度分析に向けて』（谷口和弘訳）NTT出版，2001，P.194。

再交由相关部委调整、折中，并进一步形成内阁提案，经执政党党内审查后提交国会审议并表决。实际上在政策形成过程中，主管部门的官僚代替大臣调整或斡旋，相关利益团体主导了审议方向，而族群议员左右着党内审查。这里，业界团体协会与主管部局，以及获得各业界支持的政治家议员（俗称族议员）构成了牢固的“铁三角”。由于现存利益集团（产业团体协会等）的压力，微观经济政策均长期具有明显的既得利益集团优先、生产者而非消费者优先的政策偏向。

在金融方面，直到1980年代末期政府都对银行以护送舰队方式加以保护：政府制定各种限制竞争的规则，支持银行通过卡特尔等形式获取超额利润，以帮助银行消除破产的风险。由于不允许银行实行差异化竞争，银行缺乏创新能力，经营模式僵化，业务单一，竞争力下降。同时由于长期的保护，银行形成了很强的依赖政府心理，道德风险问题比较突出。在1980年代后期大企业出现远离银行的倾向时，银行大量无节制地贷款给房地产，直接助长了泡沫经济。而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政府又疏于检查和督导，不仅不督促银行加速处理不良债权，反而在一段时期里要求银行加大对困难企业的救助。如政府在1990年代后期明确要求银行降低对中小企业贷款审核要求，在日本长期信用银行重组时政府还明确要求接手企业必须答应继续保留长期信用银行的小企业贷款支援业务。可以说政府的压力也是各金融机构加大对衰退产业或Zombie企业贷款的原因之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重新恢复了对衰退企业的保护和救助，在当年11月发布了对中小企业贷款放松条件的方案，放宽了不良债权的认定标准。2009年11月民主党政权还制定了中小企业金融圆滑化法案，进一步对中小企业贷款条件以及银行中小企业债权的分类大幅度放宽标准，从法案制定到2011年6月，相当于GDP 7%左右的巨额资金在优惠条件下贷给了相关企业。这项法案两次延长，到2013年3月才结束，也可见保护措施一旦出台便往往难以撤销。^[1]

在实体经济方面，各行业的利益团体除工会外均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建立了紧密联系。特别是农业、建筑、邮政、医疗、交通运输等大团体作为自民党的“大票田”，对自民党政权的决策影响甚大。政府历来实施严格管制，对既有产业和企业加强保护。最典型的例子，是1970年代初国家为了保证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了米价，并在此后为了防止种植过多而导致米价下跌，实施了对所有农户一律调整水稻种植面积“减反”政策。此举背离了1961年制定的农业构造基本

[1] 星岳雄、カシマツブ、『何が日本の経済成長を止めたのか』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13，pp.146-149。

法，其结果是保护了零碎农业种植户，挫伤了规模化经营专业户的积极性。^[1]在其他许多受到产业政策保护的领域里，也出现了竞争力下降的问题，波特以及竹内对1990年代日本在国际上成功的20种产业和失败的7种产业进行了详细比较后，得出结论认为成功产业大多没有产业政策支持，失败产业则多是产业政策管束过多、特别是限制竞争较多的部门。^[2]此外，在区域间资源配置方面，从70年代田中角荣政权时代开始，政府为了消除所谓城市资源过度集中现象，对特大城市（京滨及阪神工业地区）经济活动加以各种限制，限制工厂设置，减少城市公共交通建设投资等，并对劳动力的自发流动加以限制；与此同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大幅度增加了对地方经济的资金扶植，国家将大量资金投向了地方公共事业，人口稀少地区也纷纷上马建设工业园区。凡此种种干预，均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下降。

此外，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整个1990年代，历届政府多次推出了扩大财政投资的政策，使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公共建设事业。^[3]不动产建设部门在泡沫经济中负债过多，本应在1990年代受到压缩，但多次公共大投资延缓了这些产业的调整和重组。许多投资继续投向收益低甚至是无效益的地方，既浪费了资源，又导致财政赤字及累计额大幅度上升。这种做法在小泉政权时代才开始有所缓解。

可见对传统产业保护过多，对新兴企业准入或竞争的种种限制，直接弱化了日本经济的新陈代谢能力。而且由于族群政治家、主管官僚与业界的关系过于紧密，寻租行为长期存在。在立法或制定政策过程中，企业或财团向政治家、官员行贿的事件屡见不鲜；直到数年前官员“下凡”到大企业里担任高管的现象还十分普遍。

（二）政策调整机制失灵与放松管制改革的停滞

泡沫经济崩溃前后，日本的政治局势发生了较大变化。1993年自民党长期单独执政体制崩溃，形成了多党联合体制及其后的自民党与公民党联合政府。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也开始加速，如1994年将选举制度改为小选区加比例代表制，1995年的政党补助法及1998年中央部委改革法的出台等，一系列的改革都对原有的政治格局及政策形成机制冲击较大。^[4]另外，由于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所导致

[1] 八代尚宏，『日本経済論・入門』有斐閣，pp.104-107, 2013。

[2] マイケル・ポーター・竹内弘高編，『日本の競争戦略』ダイヤモンド出版社，2000。

[3] 草野厚，『歴代首相の経済政策』角川書店，2012。

[4] 曾根泰教，『日本ガバナンス—「改革」と「先送り」の政治と経済』東信堂，2008，p.204。

的各行业利益诉求增加，以及民众特别是消费者权益意识的大幅度增强，加之全球化竞争及外国政府的压力增大等等，使得政治决策过程复杂度及难度加大。原有的铁三角调整机制已然难以发挥积极作用，而新型调整机制无法有效确立，加之政权流动性极大，导致泡沫经济以后多项微观经济政策改革滞后，或问题久拖不决。这也是日本经济新陈代谢能力下降的原因。

比如泡沫经济后日本政府花了十多年才完成对银行不良债权的处理，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与美联储的快速反应形成鲜明对照，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政府不作为的典型。不良债权问题久拖不决，首先与政府特别是当时的大藏省对银行的监控和检查失灵，对不良债权额判断错误，以及银行系统依赖政府决策有很大关系；其次，特别是在处理不良债权的第一轮过程中，由于对非银行的住宅专门金融公司的救灾优先照顾了农协金融的利益，且财政埋单，导致法案出台后遭到国民强烈的反对。此后政府与政治家对不良债权的问题采取了回避和拖延的态度；最后，大藏省官僚的晋升制度及银行经营者的晋升制度都导致主要官僚及银行行长不愿在本人任期内暴露或深究不良债权问题。而绝大多数政治家，包括1997年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对问题的严峻性也没有清醒认识，使得解决不良债权问题的时机拖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的银行危机总爆发，导致19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但问题也还是拖到小泉任期内的2002年才开始得到严格处理。^[1]

再比如从1990年代起，尽管各届政府均提出要大力放松管制，但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以及政权的不稳定，放松管制改革进展极不平衡。江藤指出政府1990年代以来虽然放松了一些经济类管制，但同时却强化了社会类管制，如住宅、土地、公共设施建设类，基准和资格认证类，环境、安全、资格类，法律、保安类，以及医疗、幼儿保育、教育等类别。根据日本内阁府的自我评价，在放松市场准入、价格管制等方面，2005年电信、金融、公路运输、制造、零售行业的管制水平只有过去的二三成，但受社会类管制较多的工业废水废弃物处理行业、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业的平均管制程度反而上升了10%~30%。^[2]

更为令人不解的是，一些经过巨大努力而决定实施的改革在政权更迭后也出

[1] 村松岐夫，「不良債権処理先送りの政治学的分析」『平成バブル先送りの研究』東洋経済新報社，2005。

[2] 江藤勝，「構造改革における規制改革・民営化」寺西編『構造問題と規制緩和』慶応大学出版会，2010。

现了倒退。小泉政权时代制订的几项放松管制或民营化改革方案，比如2002年放开出租车市场、每年司法考试增加录取三千名法律各类人才、放开派遣员工管制制度等改革，特别是邮政民营化改革也在其辞职后几年之内被修正或重新加以管制。改革倒退的原因在于业界团体以及政治家势力的卷土重来。业界团体提出了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如“出租车市场放宽准入将增加事故”，“司法考试增加录取人数将降低法律人才的素质”，“派遣制度加剧劳动者之间的待遇差距”，“邮政事业民营化及邮政四大领域的分割会降低邮政服务的水平”等等。^[1]

与其他国家相比，后小泉时代日本在放松管制上雷声大雨点小。海德对世界银行公布的172个国家从2006年到2010年间开展的放松管制改革数量加以统计，发现各国平均改革数量为6.5项，而日本同期只有3项。他还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各国放松管制数量与其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如果日本达到平均改革水平的水平，GDP增长率可提高0.525%。^[2]

放松管制改革的滞后导致日本的商务环境魅力不足。在世界银行对2011年183个国家与地区商业活动难易度排名中，日本虽然居第20位，但在发达国家中排名靠后。在具体的10个管制程度项目排名中，设立公司及开业一项由于非常费时、费成本而排在第107位（OECD国平均申请时间为12天，日本为23天；必要手续OECD平均5个，日本为8个），税收手续及负担率项排在第120位（日企平均税率为49.1%，纳税平均花费时间为330小时，远高于OECD平均186小时）。其他突出的问题还有建筑开工许可手续审查严格、时间长，不动产登记手续繁杂等。^[3]而在OECD2012年发布的各国对外国FDI限制程度的排名中，日本限制指数也高达0.265，远超过OECD及调查对象56国的平均值。^[4]

上述数据均表明日本的管制过于严格，不利于商业活动。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的调查发现，2012年日本18—64岁人口中创业活动比率只有4%，低于发达国家平均的7%，亦落后于中、韩不少，在统计的68个国家中处于末位。此外日本新企业的创办率不到3%，远低于美英等国，说明企

[1] 八代尚宏，「改革はなぜ後退したのか」伊藤隆敏編『日本経済の活性化』日本経済新聞社，2009。

[2] Haidar, Jamal, “The Impact of Business Regulatory Reforms on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Vol26(3), 2012, pp. 285–307.

[3]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Doing Business 2011 (<http://www.doingbusiness.org/reports/global-reports/doing-business-2011/>)，以及星岳雄等（2013）同前著，p.140。

[4] OECD, *FDI Regulatory Restrictiveness Index*, 2012.

业的新陈代谢的确较慢。在投资方面，尽管小泉上台后就力推吸引外资，但来自外国的直接投资依然严重不足，最近几年因金融危机影响总量还有所减少，而同时日本企业大举向海外转移。以上所列举的创业难、吸引外资难固然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但政府管制过严且改革滞后也难辞其咎。其结果是不仅加剧了日本产业的空心化，也如前文所述，导致生产率较高的大企业流出而新兴企业或外资企业难以进入的问题，阻碍了产业和企业的新陈代谢，降低了TFP增长率。

对“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增长战略的评价

综上所述，19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由于经济体制的僵化，特别是金融系统结构固化以及企业系统出现了制度疲劳症，以及政治与政府在改革传统制度上的滞后或不作为等复合因素，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下降以及TFP增长率的停滞，这应该是日本经济出现“失去的20年”的重要原因。

客观地说，后小泉时代的历届政府多数都意识到了放松管制及提高经济活力的重要性，民主党执政三年期间，菅直人还提出了“第三次开放国门”的改革口号，但由于政权的不稳定以及反对势力的抵抗，改革步伐缓慢甚至倒退。2012年底随着安倍再次掌权所提出的安倍经济学（Abenomics）经济政策的亮相，标志着改革的重新启动。

安倍经济学是安倍晋三从2012年11月第二次竞选日本首相开始，着力推动的各项经济政策的总称，旨在帮助日本经济摆脱增长停滞和通货紧缩的长期困扰，恢复日本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安倍经济学主要由他自诩的“三支箭”所组成：第一支箭是大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第二支箭是机动的财政扩张政策；第三支箭则是旨在刺激民间部门、提高经济活力的经济增长战略。上台伊始，安倍便射出了头两支箭，而最后一箭直到2013年6月才射出。关于安倍经济学的金融和财政政策日本国内外已有诸多评价^[1]，本文重点分析第三支箭即增长战略。

该战略包含了产业再生计划、战略性新市场创建计划及国际化计划。^[2]主要项目归纳有：1) 促进产业新陈代谢。通过实施新税制，促进民间企业增加设备

[1] 可参见陈志恒：“解读安倍经济学：国外学者观点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第53~60页。

[2] 高海红、陈思翀：“安倍经济学经济增长战略的目标、内容和评价”，《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5期，第55~66页。

投资；激活IT网络融资和风险投资，支援创业，提高开业率水平，推动企业加速重组和兼并等；2) 提高人才水平。通过提升劳动力流动性，以及提高劳动人口中年轻人及老年人特别是女性的就业率，改进大学教育，吸引海外高级人才赴日工作等方式，改善日本的劳动力要素；3) 增加区域竞争优势。设立东京、大阪、爱知等国家战略特区，放松管制，大幅度改善外国人的各种环境和生活条件，创造世界最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外资；4) 大幅度放松管制，提升日本IT、医疗健康、能源、农林水产、旅游观光以及贸易等产业的竞争力和活力，开拓新产业前沿；5) 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以及日欧FTA，在三年内将FTA贸易量占总量之比从20%提升到70%左右，并努力拓展海外大型公共工程等业务；等等。

上述基本方向应该说瞄准了日本产业新陈代谢能力不足、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低等关键问题，也体现了政府进一步放松管制、促进竞争的意向。但增长战略在2013年6月份登场后市场的反应较为冷淡。究其原因，增长战略在纸面上与前几任政权所提出的增长战略大同小异，而且罗列了一大堆目标而甚少涉及如何落实，不被市场看好也在情理之中。

在2013年财政年度结束之际，增长战略在一些领域有所推进，如2013年12月通过的《产业竞争力强化法案》、《国家战略特区关联法案》以及涉及农业和医药改革的相关法案来看，安倍政权对原有制度或结构有所突破。特别是决定在今后五年之内废除农地休耕政策（减反政策），以及放宽对大部分药品网购的管制等政策，表明现政权正在一些领域冲击多年来强固利益团体所构筑的坚如磐石的防线。但是，细看一些方案的实际内容，感觉其力度不足，或是与当初设想相比退步。如法人减税到目前只是提前一年取消了临时设立的震灾复兴税，下降2.4%，而对法人税如何改革还需到2014年6月第二次战略提出时才有结论。再如鼓励创业项目提出三年内将创业率从近年的4.5%提升到10%以上，但直到2014年3月20日，中小企业厅才公布了第一批支援的地方自治体名单94家（仅占全国地方自治体总数的5%），而且主要支援政策是设立创业指导窗口、开办辅导班，对创业者的经济扶持仅限于降低工商登记税费、扩大担保信用额度，其政策扶植力度还不如中国的大学生创业支援。还有，政府提出增加女性就业率，将女性管理职位比例从近期的11%提升到2020年的30%，所采取的实际措施就是号召上市企业主动公布女性管理者人数等数据。据内阁府报道，截至2014年3月也只有32%的企业公布。从这些例子可管中窥豹：安倍增长战略的实际推进力度还

远远不够。这一点也是日本国内外学者的一致观点。^[1]

但笔者认为除力度不足之外，安倍增长战略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如何触动民间经济制度及结构改革这一重要领域。如前所述，日本企业新陈代谢缓慢，与金融系统和企业制度处于严重的僵化及制度疲劳状态有密切关系，为此政府需要在相关法律及制度改革方面拿出更多的意见或政策来推动金融体系与企业制度变革，但在安倍增长战略中难以看到这样的内容。以企业制度改革为例，尽管在《产业竞争力强化法》里提出了一些促进产业重组及再建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增长战略基本没有涉及公司法修订，比如现有法律中有关公司重组及法律清算的条款均有制约企业新陈代谢的问题，信息披露制度所要求的披露内容也有待于扩充，这些重要制度的修订没有提上日程，连增加外部独立董事以加强企业治理的意见虽经过多年讨论也难以写进法规。在雇佣制度方面，迄今为止政府也没有任何提高正式员工雇佣弹性的实质性改革措施，雇佣法关于解雇的规定等也难以撼动。在金融领域，政府在2014年3月刚提出了《促进民间非正规金融融资修正法》交由下期国会审议，旨在放开创业企业通过互联网集资的管制。关于培育风险投资基金，政府只是在《产业竞争力强化法》里提出了对大企业建立创业基金的税收优惠制度，而在整个金融结构及制度的设计方面没有着力。诚然，金融系统结构和企业制度具有路径依赖性，且有些制度是不成文的习惯和传统，其问题并非都能通过政府主导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就可以解决，但政府通过修改法律给予企业在法律上新的约束，或放松管制给民间企业提供制度改革的空间，将诱导或推动金融机构和企业改革其经营模式，加速制度创新。笔者认为真正长期有效的增长战略，应该更多思考如何更好地带动民间经济主体行动起来，加快民间主体主动革除其自身体制弊端，创新经营管理模式的进程，而不仅仅靠财税优惠的诱导，使得企业因有依靠而滋生惰性，降低革新僵化制度的紧迫感。本质而言，民间经济主体的活力增强及不断革新，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2014年6月底，安倍政权将推出其第二期增长战略，以目前的形势来看，该战略依然难以有实质性突破。安倍经济学到底能走到哪一步？我们拭目以待。

[1] 高海红、陈思翀：“安倍经济学经济增长战略的目标、内容和评价”，《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5期，第55~66页；沟端干雄等（2014）「アベノミクスの2年目の評価と課題」大和総研報告。

结语和展望

本文主要从供给角度分析了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的主要原因，并特别分析了导致TFP增幅放缓的微观机制，指出传统金融系统及企业体制的僵化或制度疲劳，以及政府管制体制的固化和调整改革的失灵，是导致经济新陈代谢功能弱化，从而导致TFP增长放缓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安倍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战略，指出除力度不够外，该战略特别忽略了引领民间主体加快体制革新的内容。若传统经济制度和结构不能改革，日本经济的窘况就将难以改观。

因篇幅所限，本文对影响日本经济供给方面的另两个要素——资本投入以及劳动力投入没有做具体分析。实际上，1990年代以来资本投入以及劳动力数量投入的增幅下降，也与日本经济体制僵化、新陈代谢能力下降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比如由于金融体制的滞后导致资金难以投入新产业；同时由于企业体制僵化，革新能力及灵活性不足，产业调整速度缓慢，也自然阻碍了资金投入。而日本劳动力投入下降以及人口出生率低迷等问题也直接或间接地与传统企业制度，特别是企业内独特的雇佣制度及男女有别的企业人事用工习惯，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封闭性等有着直接关系。若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出现突破，从长期来说，资本及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指标应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当然，对成熟经济国家的日本来说，提高资本投入的增幅及减少劳动力投入降幅难度均较大。因为一方面日本的资本装配率以及人均资本存量已非常高，资本边际收益较低，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日本的储蓄率近几年也大幅度下降，显然，国内资本投入的大幅度增长已不可能；另一方面日本也无法摆脱人口减少的宿命，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难以期待。基于这些原因，可以肯定地说，中长期里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只能维持在低位增长状态。对日本来说，最有可能性的是通过提高TFP增长率来达到提高日本经济增长率的目的。换言之，日本经济是否可以真正摆脱“失去的20年”，主要还是要依靠不断破除僵化体系的束缚，创新制度，建立竞争和创新的环境，提高经济新陈代谢水平，从而提高TFP增长率并推动经济增长。这也正是本文重点讨论日本经济体制问题和体制改革的意旨所在。■